

青砖刻岁月 烟火暖唐塔

——郓城观音寺塔的新生故事



唐塔夕阳红威风锣鼓秧歌队正在表演



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

王玉芹在郓城唐塔下跳了将近十年的秧歌。对她而言,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的古塔,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塔还是那座塔,一直静静看着我们。但周围的生活变了,广场建好了,大家聚在这儿活动,心里特别敞亮。”12月25日下午,在郓城县唐塔广场,刚跳完一曲的王玉芹擦了擦额头的汗,望向身边巍然屹立的古塔,脸上舒展着笑容。

她口中的“唐塔”,是郓城县的地标性建筑,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郓城观音寺塔。此塔始建于五代后唐长兴二年(公元931年),历经千年风雨,如今已演变为融入市井生活的文化核心,见证着这座“千年古县”的变迁与新生。

深埋的历史与凝固的技艺在砖石间悄然苏醒,塔身的每一块青砖都铭刻着时光的印记。

观音寺塔,当地人多称“唐塔”,也叫“荒塔”。“荒”字,道出了它曾经漫长的孤寂。塔原为7级,明正统年间黄河决口,泥沙将下部三层深埋入地下。“勘探发现,地下约15米处才是塔的基座,现在地面上仅存4级,通高28.1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黄河淤积反而‘保护’了塔的下部结构,使其免受更多人为破坏。”郓城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杨涛介绍。

这是一座全砖结构的八棱四门楼阁式塔,体量雄浑,风格迥异于后世宋塔的纤秀。塔身由大亭泥方砖砌筑,东、南、西三面设券顶门龛,北面为塔门。塔檐由精巧的砖雕斗拱层层叠叠挑出,每个棱角曾悬挂铜铃。塔身虽朴素,几无繁复雕饰,但其斗拱的承托方式、假窗的样式,均透露出唐至五代时期的建筑风格。“它展示的是浑厚的唐代遗韵,”杨涛指着塔身说,“尤其是塔内回廊的构造,既有唐代特征,又有向宋代过渡的痕迹,是研究该时期建筑技术演变的珍贵实物例证。”

古塔总与传说相伴。郓城民间流传最广的,是“托塔天王”的故事:此塔原为李靖手中宝塔,因父子情深,塔断为三截,塔基落郓城,塔身飞巨野,塔顶飘汶上,故鲁西南这三座古塔形制相近。另一个美丽传说是“荒塔云燕”:每年春末夏初,无数云燕绕塔飞鸣,相传是受戾刑的军事家孙臧魂归故里所化。

这些传说为冰冷的砖石注入了温暖的生命力,也寄托着当地人深厚的情感。尽管塔前的观音寺早已湮没于历史,塔内佛像亦在动荡中遗失,但这座塔本身,已超越单纯的宗教遗存,成为郓城人集体记忆与地域认同的精神坐标。

观音寺塔的保护历程,是新中国文物保护理念演进的一个缩影。据档案记载,1956年,郓城县便对塔顶及内部台阶进行了初步修缮。1992年实施大规模彻底维修,采用钢筋网混凝土加固塔体,并增建保护性塔顶防雨亭。1998年,治理塔周坑塘,以蘑菇石护砌,增设汉白玉栏杆与石桥,改善了塔基环境。2017年,国家文物局拨款120万元,由专业机构对塔身进行精细维修,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,更换风化砖体,补修塔檐。

“保护理念在不断进步,”杨涛表示,“从早期的抢险加固,到注重周边环境整治,再到如今强调预防性保护和最小干预,目的都是让这座千年古塔能健康、长久地屹立下去。”

保护之中,古塔与公众的关系也在重塑。曾

经,古塔被围墙围护,虽得安全,却与民众生活疏离。2004年,郓城县委、县政府决定拆除围墙,以古塔为核心,建设开放式的唐塔广场(又称唐塔公园)。这一举措,彻底改变了古塔的存在意义,使其从封闭的文物遗存,转型为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。

如今的唐塔广场上,古塔静立如昔,四周开阔,绿树掩映。围绕它展开的,是一幅生动的市民生活图景——北侧设有便民健身器材、儿童游乐设施和彩色塑胶跑道;开阔的场地白天可见老人散步、孩童嬉戏,下午至晚间则成为文艺舞台:秧歌队彩绸翻飞,广场舞步点欢快,街头歌者浅吟低唱,非遗、民俗表演引来阵阵喝彩……

王玉芹和她的“唐塔夕阳红威风锣鼓秧歌队”,正是这幅图中活跃的一笔。队伍从十余人发展到数十人,古塔是最忠实的观众,广场是展现活力的舞台。“以前觉得文物就是老古董,看得见摸不着。现在不一样了,它就在我们身边。”王玉芹说。在这里,历史遗存成了市民晨练的背景、孩童玩耍的参照、邻里闲聊的话题。

广场也成为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的天然场所。农村文化艺术节、秧歌比赛、广场舞大赛、惠民促销活动……古老地标被注入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,人气日益旺盛。

文物活起来了,历史也有了温度。夜深时分,人群渐散,古塔重回宁静。然而,这份宁静与千年来的“荒寂”已然不同。它浸润在人间烟火里,既承载着过往的厚重,也聆听着当下的欢歌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劭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斯文」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有两种解释:一是指文化或文人,二是指文雅。严格来说,“斯文”并非鲁西南的方言土语,之所以将其归入鲁西南的方言表达,是因为这个词在鲁西南民间的语义发生了一些变化,且读音也产生了明显的转变。

在菏泽等一些地方,“斯文”被读作“湿委(音)”。它的使用场景是这样的:例如,夫妻二人一同走亲戚,时间已经很久了,一方却磨磨蹭蹭,迟迟不动身,于是已准备好的另一方可以责备道:“别再‘湿委’啦,赶紧动身吧!”在这里,“斯文”的含义转变为略带讽刺的贬义词。此外,它指性格上的犹豫不决,比如评价某人办事优柔寡断:“这人干啥事都‘湿湿委委(音)’,办不成大事。”“湿委”这个读音主要用于贬义。

而当这个词作为正面、褒义的词语使用时,其在民间的读音又变得与普通话的“斯文”相近。例如,在相亲场合,一方家长或亲戚这样评价男孩或女孩:“这孩子斯斯文文的,看着性格很好。”那这门亲事大概率能成。反之,如果评价说:“这孩子说话办事‘湿湿委委’的,一点不爽利。”那亲事很可能就告吹了。同一个词语,因普通话与方言读音的不同,竟完全走向了意义的反面,这在鲁西南方言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一例。

那么,为何普通话的“斯文”在鲁西南方言中成了“湿委”,且带上了贬义呢?这与历史上部分读书人的食古不化有关。新中国成立前,民间有文化的人很少。读书人因较少参与农业生产,不擅农活,常给人做事慢的印象,因而留下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的评价。加上常年读书带来的性格稳重与言谈间的引经据典,在普通人看来便显得另类。更有一些读书人迂腐至极,说话办事到了迂腐的地步,更为大众所鄙夷。这类人物形象用书面语描述就是“迂缓”,意指迟缓、磨蹭,这就与“湿委”画上了等号。

清代文学家纪昀(字晓岚)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一则《傅显迂缓》的故事,正描绘了这样一位读书人。大意是:纪晓岚有个年轻的奴仆叫傅显,喜欢读书,也懂文义,却因读古书成了书呆子,性格迂缓,走路说话都像行动迟缓的老学究。一天,他迈着四方步慢吞吞地走到市场,见人就问:“见魏三兄否?”有人告诉他魏三在哪里,他又慢腾腾地找去。见到魏三后,他喘息良久,魏三问找他何事。傅显这才说:“刚才在井边,看见您妻子在井边做针线活,累得睡着了。您的小儿子在井边玩耍,情形很危险。但男女有别,我不便叫醒尊夫人,所以来找您。”魏三一听大惊,急忙奔往井边,但妻子已趴在井口为孩子溺水而痛哭。纪晓岚对此评论道,读书本是好事,旨在明理。但若学而不能通达,反致性情迂腐怪僻,则贻害无穷,这样的读书人又有何值得称道呢?

可见,“斯文”一旦过度,便走向了反面,成了“湿委”。为了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,鲁西南民间通过读音将一词赋予了“一体两面”的含义,这大概也是民间智慧的一种体现吧。

张长国

范庄寨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范庄寨村位于曹县城西北22.4公里、韩集镇政府东4公里处。全村总面积1.9平方公里,其中耕地面积1.38平方公里,村落占地0.52平方公里。聚落略呈正方形,有三条东西街、两条南北街,主街分别长约800米和790米。现有240余户、1100余人,村民以范姓为主,另有彭、朱等姓。

范庄寨原名范庄,因村内有大型水坑,亦称范水坑。1938年,为抵御日军侵袭而修筑寨墙,故改名范庄寨。《曹县志·村名由来》记载:清康熙年间,范维修从堤上范村迁此定居,取名范庄;因村中有大水坑,又名范水坑;1938年为抵御日军侵袭而筑寨,故改名范庄寨。贵州省安顺市原代市长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范连珠即出生于此村。

范连珠于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,曾任联合村党支部书记。1939年起,先后担任曹县韩集区委组织委员、李集区委书记、区队指导员、区抗日联合会主任等职。1949年随军南下,历任赣东北区德兴县海口区委书记、区队政治委员。同年11月起,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地担任党政领导职务。1966年后,历任安顺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市委副书记,安顺市代理市长,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。

这一时期,范庄寨村投身革命的不仅有范连珠,还有范连贵(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东明县委书记、郑州市市长)、范登峰(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)、范连登(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菏泽市[县级]人大常委会副主任)、范贵山(1949年牺牲)等。

范庄寨村之所以涌现众多革命者,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该村位于“红三村”东侧,是当地规模较大的村庄。为抵御日军侵袭,村民自发修筑了高、宽均达十余米的寨墙,并在寨外挖掘两道称为“海子”的防御壕沟,沟内设有地道与寨内相连。修筑寨墙和壕沟时,周边十余个村庄的村民纷纷前来协助。每当日伪扫荡,附近村民也常来此避难。范庄寨村因而成为周边地区的防御堡垒和避难所,也成为日伪扫荡的“眼中钉”。频繁的扫荡与袭击,反而激发了村民的抗日决心,使该村成为拥军支前的模范村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范庄寨村重视教育,人才辈出,范明义是其中代表之一。

范明义,生于1950年11月,中共党员。1968年3月入伍,历任空降兵第四十五师一三四团战士、师司令部参谋、第十五军司令部参谋、第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参谋长、团长等职,三次荣立三等功,三次获军级嘉奖。1988年1月,转业至菏泽地区税务局任科长。1994年12月起,任菏泽地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。1997年,他组织该局开展规范化管理工作,成效显著,获全省第六名;地区国税局机关获“省级文明单位”称号,并被省妇联联合会评为全省城镇妇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先进单位。 丰瀚 鄞鸿

鲁西南风情 旋锭子



民谣曰:小锭子,尺把长,东庄老头旋得忙。先旋一支枣木锭,又直又滑分量重;再旋一支椴子木,古铜颜色条纹粗。两只锭子买回家,吱吱扭扭扭扭扭棉花:头天纺了半斤整,二天纺了八两八。

在中国乡野,纺线曾是家庭妇女的日常技艺。其中核心部件木锭子,不仅是纺车的核心,更承载着手工劳动的智慧。纺线时,匀速摇动纺车大轮,带动锭子高速旋转,使手工纺线从抽纱转向加捻,从而提升纱线的均匀度与产量。

锭子一头稍尖,便于插入纺车转轮;另一头微微膨起,形成圆滑的“磨儿”,可防止线穗滑脱。其形制简朴至极,却蕴藏着在局限中创造丰饶的古老智慧。

传统锭子多选用枣木、柳木等细密耐用的木材,其中柳木易加工、不易变形,使用最广。

匠人制作锭子,称为“旋锭子”。选料讲究“圆木破四半无疤者”,以拇

指粗细、长约40厘米的圆木为佳。先将木坯刨圆,两端削尖,再固定于自制铁床上,一手持铁刀,一手拉弓,木坯飞转,刀下新锭子轮廓——中部微凹,两端渐尖,便于缠线。

成形后需“捻锭”校直。匠人凭手感与眼力,轻转锭体,察其弯曲,再逐段调校,直至笔直。因锭子不直,则纺线易断不均,故直挺为纺线成败关键。

“男耕女织”是古典生活的图景,而“织”的背后,是更基础、漫长的“纺”。纺车嗡嗡,响在女儿待嫁的憧憬里,响在幼几啼哭旁,也响在战乱饥荒的忧虑中。那绵绵不断的线,曾是维系家庭的生命之索。

而今,木锭子已退出日常,成为记忆的凭证。我们凝视它,如同触摸一段失传的秘密。保护这门手艺,不仅是对技艺的尊重,更是对乡土记忆的守护——让人们在现代喧嚣中,仍能听见纺车上那轻轻转动的古老回响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市井繁华成过往 巷陌沧桑映眼帘

——单县老城隅首的“记忆锚点”

在鲁西南的土地上,单县老城隅首并非简单的地理坐标,而是镌刻着岁月纹路的“城邑活化石”。

“隅首”一词自元代起便在这片区域生根,专指城邑、集镇或村落中东西与南北大街的交会核心。它是古人规划空间时对“中心”的诗意命名,更蕴含着“四方辐辏、烟火聚集”的生活哲学。

如今的单县老城,其街巷格局可追溯至明嘉靖五年(1526年)。当时筑城取“天圆地方”之意,城郭呈规整方形,主次街巷纵横如棋盘般铺展。41条街巷在时光里交织出11处隅首,刘隅首、贾隅首、石隅首等称谓,不仅是地理标识,更承载着家族记忆与行业传承——它们或因姓氏之众、权位之显、财富之厚、名望之广而得名。例如贾隅首,便因明清时期贾姓商人在此开设绸缎庄、杂货店而形成商脉。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是一段鲜活的老城往事。

在单县老城的隅首中,刘隅首无疑是最为耀眼的“明珠”,被誉为单县的“隅首之首”,也是至今大众仍习惯使用的唯一方位名称。它地处老城心脏,胜利街、东关街、衙门前街与南关街在此交会。这四条街道如同城市的主动脉,汇聚着四面八方的人流与生气。明清至民国时期,刘隅首是单县商业的“黄金十字路口”:北侧的绸缎庄挂着色彩艳丽的绛罗绸缎,随风轻晃;南侧的杂货铺里,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的气息混杂着伙计的吆喝;东侧的铁匠铺火光四溅,敲打声清脆悦耳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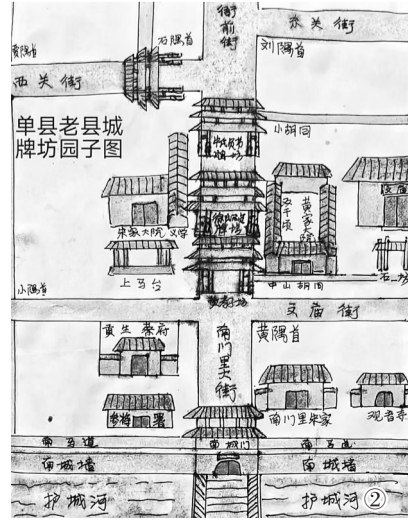
西侧的茶馆里,说书先生拍响醒木讲述《三国》,茶客的喝彩声此起彼伏。

更让刘隅首升华为“文化符号”的,是百年老字号“三义春”羊肉汤馆。清末民初,“三义春”在此开门迎客,以单县本地山羊的新鲜骨肉和地下水精心熬制,汤色乳白,鲜香醇厚,佐以烙饼,成为了单县人舌尖上的故乡滋味与难忘乡愁。

严冬清晨,刘隅首的石板路上,寻味的食客接踵而至。一碗热汤驱散晨寒,也唤醒了老城热闹的一天。“喝碗羊肉汤,逛隅首老街”,曾是单县人最寻常也最珍贵的生活图景。

如今,单县老城虽历经变迁,但隅首依旧是城市深植的“记忆锚点”。漫步刘隅首街头,于老店新铺与街巷弄堂间,仍可寻觅旧时痕迹。偶尔有老人坐在街角石凳上,讲述着宅门前昔日的喧嚣与繁华。这些由街巷交会而成的“城市节点”,不仅见证了单县从明清到现代的沧桑巨变,更将鲁西南的市井文化、商业精神与饮食记忆代代相传,成为单县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人文地标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- ①隅首遗址上新建的孝善文化景观
- ②单县旧城隅首示意图及牌坊园子示意图
- ③出土的连接隅首的衙门街石板路车辙遗迹